

他是南方民族学的先行者

——知名学者周大鸣谈容观琼先生

■ 本报记者 陈师琪



容观琼教授近照

容观琼先生今年 92 岁高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早期元老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的一生钟情于少数民族研究，为此付出了大半辈子的辛劳，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就，至今仍受学界称赞。耄耋老人，经过了怎样的岁月沉潜？如何取得令人敬仰的学术成就？对人类学研究具有哪些贡献？在历史悠久的马丁堂里，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为我们介绍容观琼先生的治学经历与成就。

田野调查：他一直走在最前面

容观琼常说：“我的身体是少数民族给的！”他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此走过大江南北，经常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在他看来，这个过程锻炼出健康的身体。从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工作训练，到毕业后参与中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再到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训练，田野调查贯穿容观琼工作的始终，奠定了他研究的基础，并使之与少数民族结下不解之缘。

记者（以下简称“记”）：容先生为什么会调查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周大鸣教授（以下简称“周”）：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务院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的工作，容先生受指派参加了中南地区的调查组，他们的调查范围比较广，中南地区的黎族、瑶族、壮族、侗族等都有调查过，并且是做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后容先生也参与编写《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黎族简史》等调查报告。容先生调查最多的是黎族和瑶族，对这两个民族的民族史、民族迁徙、民族文化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

记：当时田野调查的环境、条件怎样？

周：当时的田野调查有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艰辛，中南很多地区尚未通车，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上或比较偏僻的地区，有些还是跟外界隔绝的地方，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物质条件也很匮乏。调查过程非常辛苦，据容先生介绍，每次转移调查地点，他都和同行严学宥老师、刘耀荃所长三人组成一支“先头部队”，赶在队伍之前到下一个调查点探点，联系当地居民，向他们借宿、购买食物等，做好后勤工作。

治学路径：他强调多学派综合研究

容观琼求学期间师承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杨成志素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称，他不仅在人类学领域上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作用的研究工作，促进早期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真正形成，而

且创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一研究阵地，培养了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钊、顾铁符、王启树、戴裔煊、容观琼、张寿祺等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对以后南方人类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杨成志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强调实际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身进行过长期且艰难的田野调查，成为第一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中国学者。容观琼读书期间，先后跟随杨成志先生到粤北瑶山、海南岛、广西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在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获得田野调查的精髓，打下了扎实的治学基础，并一直将杨先生的教诲谨记于心：“我们的研究路线要用脚爬山开踏出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版出去！换言之，靠自己辛勤跋涉比拾他人被动见闻所得到的原料和素材具有较为切实正确的科学根据。”这句话也成为容观琼治学方法的写照。

记：田野调查在杨成志和容观琼先生的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周：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杨先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率先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在当地学习、研究彝语和“罗罗文”，后来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得法国博士学位。此外他调查过苗族、瑶族、傣族等，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等著作。容先生是杨先生的基础上进行更广阔范围的田野调查，容先生取得的成果也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

记：学术界向来将杨成志先生和吴文藻先生并称“南杨北吴”，并认为以杨先生开创的南方学派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和获得第一手资料，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周：从杨先生开始，南方人类学的研究非常注重田野调查，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由杨先生开创的研究方法远远不只这一点。杨先生和容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强调多学派的综合研究。容先生认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同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是相互渗透的，现代研究的很多课题往往牵涉到不同学科的协同攻关。拿文化人类学来说，很多具体的研究需要运用到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多学派的知识，容先生的研究就常常是综合了各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

记：容先生在民族学研究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周：容先生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民族史方面，他是将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史结合起来研究的，在少数民族的来源、迁徙、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等问题上都有不少创见。后来在编选容先生的论文集

时，他自己选的文章大多数也是民族史方面的。从人类学的应用方面来说，容先生是本土化研究的一个范例。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食洋不化，容先生能够将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应用得比较好，他着力吸收国外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他学术研究一个较大的特点。

民族建设：他敢于“泼冷水”

在容观琼看来，对少数民族的调查，最终要应用到少数民族的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上，他强调调查的科学性，也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成为外界社会了解少数民族的一个窗口，对国家设立民族自治区、规划各省区的民族建设，颁布民族政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容观琼本身也参与到少数民族建设规划的讨论之中。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用 20 年时间赶上 80 年代的台湾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在很多人看来十分振奋人心，而容观琼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以一个民族学者的专业眼光冷静地看待海南岛的发展问题，敢于泼冷水，这是因为他了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希望真正促进少数民族的良性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一个经济目标，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才能使该地区真正得到发展。

记：当时在海南岛建设问题上，容先生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周：在容先生看来，当时发布的《海南岛经济发展战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海南的发展，忽视了对海南岛具体的人文环境。海南岛有一半面积以上住着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被忽略了，他因此不赞同这份发展战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黎族地区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改变人》，强调地区的发展还要充分考虑非生产性的因素，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彝族长期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地区，经济水平有限。容先生就认为发展当地经济不能光靠扶贫，那是“一厢情愿”，而是要靠改变当地人的心态和素质来实现。

学科建设：立德立言 以启来者

1981 年，在梁钊钊等先生多方奔走的努力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复办，成为国内第一个恢复办学并且具备本科生、研究生招生资格的人类学系，梁钊钊任系主任。其时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的容观琼被调回中大，任人类学系副主

任，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容观琼正式调回中大之前，中大人类学系的招生信息早已公之于众，重兴教学、规划课程成为等待着容观琼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阔别母校多年的容观琼抵达中大时，他尚未来得及走访亲友，便全身心投入到接收学生、安排教学的工作中。此后，安静的中大校园为他提供了潜心学术、总结成果、著书育人的良好环境。

记：容先生回到中大任教以后，其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进展？

周：容先生的很多学术成果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他发表了很多论文，出了一些书，如《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民族考古学初论》，其中后者被认为是民族考古学的拓荒之作。后来我们将他的部分成果集结出版，有《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和《人类学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是我们将容先生有关人类学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文章进行搜集整理出版的，当时还专门办了个会议。这些文章是容先生根据自己研究的实践，结合人类学理论来写的，是经过自己消化之后写出来的理论研究，避免了“洋八股”的影响。当时关于人类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比较少。

记：容先生在中大人类学系开设了哪些课程？

周：容先生对人类学系开设了一些基础课程，主要有本科生的《人类学概论》和研究生的《民族学与考古学专题（含民族考古学）》等。可以说当时在国内开《人类学概论》这门课的，容先生属第一人。这门课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这在当时国内的教学中是非常少见的，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人把《人类学概论》等同于解放初讲授的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教材，容先生上课的内容、讲义都是靠自己设计的，后来这门课的讲义整理之后是打算出书的，书名就叫《人类学概论》，是国内第一本自己编的人类学教材，但是因为出版社人员调动的原由，就没有出成——当时要出一本书是比较大的事。后来书稿中的两章《文化与文化变迁》（上）（下）收入了《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容先生比较重视教学质量，教学过程中也不断总结经验，在这方面也写过一些文章，如《教学实践给我们提出的课题》，收入《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这本书里。

记：容先生对学生有哪些要求？他注重培养学生怎样的素质？

周：容先生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较广的知识面。有一些研究生本科阶段没有上过《人类学概论》之类基础课程的，容先生都要求他们去旁听本科生的课程，打好基础。容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他自己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

民族学和民族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把握，他比较强调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因此他也希望学生能拓宽知识面，多了解相关学科的内容。此外他还强调学生要有提问精神，要学以致用。

记：您觉得容先生身上的哪些特质对学生影响较大？

周：在学术研究之外，容先生待人处事的态度应该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为人谦和，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还有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前两年还经常见到他去图书馆，退休后他还在继续学习。

容先生二三事

●回忆一起做民族调查的日子，容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问题，而调查途中的艰辛在他看来不值一提。有一次到黎族地区作调查，黎族人民腾出最好的房间招待客人。即便是最好的房间，家具还是十分简陋。调查人员两三人合用一张床，半夜里竟把一张床睡塌了。大家自以为闹了笑话，十分抱歉，屋主却笑着说，没事，这事经常有！还有一次到海南岛，正值岛上闹蝗虫灾害，调查人员双脚都被虫子咬得红肿流血，疼痛无比，只能躲在屋子里几天不出门。容老说，我们能这样躲几天，当地人却无处可躲。他深深感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之艰难，一直以来为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竭尽所能，更希望少数民族的生活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筹建少数民族博物馆，也是他努力的一项内容。1955 年，在多年收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物的基础上，容观琼筹建成立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馆。作为了解少数民族的窗口，文物馆承担着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建设的重要功能。此后的几年间，他寸步不离文物馆，为之日夜操劳，亲自过问大小事务，以至于每年暑假只有一两天时间能够回家。工作的繁忙让他难以顾及家庭，说起这个，容老总是对家人满怀歉意。

●留学美国期间，容观琼曾省吃俭用买下一套人体测量仪。这套仪器后来一直被视为珍宝，珍藏多年。2005 年，他将整套人体测量仪器共 7 件赠送给人类学系，希望它们在年轻学者手中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容先生从未停止关注学术动态和人类学系的建设，人类学和人类学系的健康发展，是他一生的夙愿。

《中大童缘》序

■ 中文系 黄天骥

翻开《中大童缘》，读到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掩卷低回，不禁感慨系之，神为之醉。

中山大学的康乐园，是一块美丽清幽使人向往的神奇土地。作为南中国的最高学府，这里培育过无数的社会栋梁，聚集着从事教学科研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俱兴，人们欢欣鼓舞，可是很快又受到“左”毒冲击。在康乐园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在时代的波涛里载沉载浮，晕头转向。他们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经历，实际上也是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面镜子。

《中大童缘》的作者们，都是中山大学的教工子弟，他们在康乐园里度过了童年。和许多孩子一样，他们天真烂漫，读书玩耍，不知人间何世。但和一般孩子不一样的，他们聚居在宁静优美、如诗如画的校园里，这比住在穷巷陋室的孩子生活要优越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亲朋，多是大学里的专家教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家庭的背景，让这特定的群体，从小就有良好的文化素质。

可是，就在如花似玉的童年，这批小孩的父母，却在思想上、生活上受到种种冲击，有些人甚至家破人亡。这一批孩童经受过种种切肤之痛，又是康乐园外的孩子们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如此，在时代风云变幻之际，他们比一般懵懵懂懂的孩子更能敏锐地感悟到生活的落差以及人间的冷暖。现在，当年在康乐园里摸爬滚打的孩童，也已两鬓微霜，纷纷进入晚景。经过了生活的磨炼，具备了人生的阅历，他们回首前尘，童年往事，刻骨铭心，便决定把无法割

舍的中大情缘，形诸笔墨，奉献在读者面前。这集体的记忆，朴实而活泼，也最能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中大历史的面貌。

《中大童缘》的作者们，写到了他们童年时代在中大的许多见闻，但我关注的，是他们对当年家庭生活和父母行止的描写。

在 1949 年以后，特别是在“文革”之前，中山大学和全国高校一样，在轰轰烈烈而又跌跌撞撞中前进。这段日子，从事教学科研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复杂微妙的？为什么他们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虽九死其犹未悔”，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生？这些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思考，许多人对此或有所认识，却嫌浅薄而抽象。加以随着时光流转，前辈们的业绩，也被逐渐遗忘。特别是当今在康乐园里学习和工作的年轻学人，也许知道陈寅恪、姜立夫、容庚、戴锡龄、卢康侯等教授的名字，但已无法想象他们当年是怎样的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背负重轭，在艰难的日子里依然不懈地钻研学术。这一来，如果人们从来不知道前辈学人道德文章的具体面貌，又从从来不知道这历史名校的学统，又怎样称得上能够继往开来？更让人惋惜的是，本来这段时期康乐园教授们的命运，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甚至可以作为特定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缩影，但这一切，都被历史波涛淘洗冲撞，显得空虚苍白。

难得的是，《中大童缘》的作者们，忽发宏愿，忽发奇想，他们把童年在中大生活的记忆，拾捡起来，写成文章。这些文章，有欢乐，有泪水，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 20 世纪下半叶康乐园的面貌。他们写到在幼儿园（园）和小学里的生活，写

到大学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特别是写到他们父母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以及当年长辈一颦一笑的面貌。由于他们在童年结缘于中大，对这片美丽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们笔下的一幅幅图景，一缕缕情思，汇聚成集体记忆的河流，很能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通过他们所写的大事小事，趣事悲事，歌哭笑啼，人们也可以窥见当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

我从 1952 年进入中山大学求学，到如今，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也过了 60 年了。我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大童缘》的作者们的童年时代。康乐园这片土地，有一段时期，成了我和作者们生活的交集点。许多作者的父母，是我的老师和前辈；好些作者童年的形象，我也还依稀记得。因此，翻阅《中大童缘》，感到分外亲切，书中重温过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常在我心中引发共鸣。我也记起了蒲桃园和北门的水塔，记起了在珠江边吃岭南木瓜，特别记起了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记起了小楼里老师们深夜工作的灯火。当然，我也记得在那荒唐的岁月，老师们被批斗被刺头被凌辱的可悲情状。读着这本书，我深切地感悟到：往事并不如烟，真堪回首。“温故而知新”，只有把点点滴滴的历史真相记录下来，描绘出来，总结为经验教训，我们今后的道路才会走得更宽更广，教育事业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在中山大学迎来 90 周年校庆的时候，先师们的后人，纷纷把他们在童年的所见所闻，连同一份赤子之心，献给学校。作为老中大人，我理解此中深意，所以不揣浅陋，写上一点读后的感受。



主 编 蔡宗周
副主编 吴行赐 李少娜 夏纪梅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出版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由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读于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和生活在康乐园的中大子弟们所写的回忆文章的集结。作者情真意切，用朴实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中山大学的景物和风采，以及当年康乐园儿童透明的心怀，散发着那个年代特殊的人文关怀和温馨气息。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往事篇》，下册为《童年篇》，合共五辑。“父辈往事”，是对父辈们当年兢兢业业、满腔热忱地在中大从教和工作的追忆，对他们无私奉献的赞颂和缅怀，其中涉及陈寅恪、容庚、梁宗岱、王起、戴锡龄、陈序经、王越、刘渠、楼栖、端木正等数十位名教授鲜为人知的往事，且从儿童的眼光落笔，多了一层亲切和趣味；“难忘往事”，记述了中大子弟与父辈当年在康乐园生活时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作者之一容国濂与爷爷容庚

在欢乐与泪水相伴的岁月，自然给人留下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记忆；“童年趣事”，描写了这一群孩子当年在康乐园度过的幸福快乐时光，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记忆，反而增添了温暖和亲切；“校园物事”，记叙了中大至今保存或已经逝去的一些标志性风物，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厚重；“附小轶事”，则是对培育自己成长的可爱学校与人生摇篮的回眸，当年的校园、老师、同学、朋友，牵动着心底难以割舍的童缘。本书的作者大多已近花甲，有的已届古稀之年，如今星散于世界各地，在中山大学建校 90 周年之际，他们拿起笔来写下心中的情愫，并编成此书，作为中大子弟们献给中山大学 90 周年校庆的一份礼物，以表达他们对康乐园深深的敬意和无尽的眷恋。